

東吳大學

東吳歷史學報

第九期

清遺民的心態及處境：
以劉聲木《萇楚齋隨筆》為例

林志宏



東吳大學出版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三月

臺灣 台北

清遺民的心態及處境： 以劉聲木《萇楚齋隨筆》為例^{*}

林志宏^{**}

摘要

本文企圖從過去研究鉅型知識分子和政治復辟活動之外，分析清遺民的心態和處境。以劉聲木的《萇楚齋隨筆》為例，我的討論主要有三部分。第一，談到劉聲木的「思想資源」，藉以瞭解清遺民的心態。其次，從劉聲木對風俗嬗變的看法，觀察他是如何對待綱常觀念與社會秩序間關係，並作詮釋。最後的部分以清遺民編纂傳記、衣著及出處等角度，探索其意義。

《萇楚齋隨筆》在以往多被視為文獻學著作，未曾注意作者想要表達的意涵和對時代脈動。事實上，書中所討論的禮教、新式教育、婦女地位乃至孝道看法等，均係清季民初潮流下的公共輿論。劉聲木各式各樣的論點和態度，也正說明清遺民在民國初年「政治文化」當中的處境和反應。

關鍵詞：清遺民 劉聲木 萇楚齋隨筆 風俗 政治文化

* 本文撰寫期間，承蒙業師王汎森教授的教導啟發，嗣後得到李顯裕、蔡宗憲、趙立新、吳雅婷、何淑宜與廖宜方等諸位學長斧正，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這篇短文裡，我想藉劉聲木（1878-1959）的《萇楚齋隨筆》為例，¹嘗試分析清遺民在民國以後心態和處境。本文關心的是究竟清遺民面臨的時代問題為何，又是如何來因應的？由於這部讀書筆記涉及的內容相當豐富，²因此焦點集中在以下三點方向。首先，要討論清遺民的心態，不免談到他們根據的「思想資源」問題。關於劉聲木的思想資源，《隨筆》內容及書後的引用書目某個程度可提供我們這方面思考。接著我打算從劉聲木對風俗的看法，來窺測清遺民如何對待綱常觀念與社會秩序間關係，並作詮釋。劉氏這些觀察可能是初步的，而且也帶有個人片面的意見，但我認為如果做為清遺民共同想法，其實頗具代表性。最後的部分則利用內容分析處理該書中呈現清遺民在民國的動態，說明其具備的儀式及意義。有關第三部分，個案分析顯然無法充分地表達，所以討論將擴及到其他清遺民的文集、年譜等資料。

本文所以選擇劉聲木做為個案，不外有如下因素：其一，歷來探討清遺民事蹟，大多關注他們在民國的政治活動，例如和帝制復辟之間的關連，³往往以成敗來論定，甚至直接賦予「負面」的標籤。造成這樣普遍的看法當然基於我們「後見之明」，但是否就能夠反映歷史真相？其二，由於清遺民的資料過於分散，以往研究的焦點多半集中於少數著名的鉅型人物，像梁濟（1859-1918）、王國維（1877-1927）等，探析他們在辛亥以後的心理轉折及行動。⁴我認為這

1 劉聲木，《萇楚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以下將採《隨筆》、《續筆》、《三筆》等方式及卷數、頁碼列之。

2 如近人討論學案體的出現，劉氏書中早已發之，該書《隨筆》卷五（總頁 107）及《三筆》卷二（總頁 503）等均是。關於近人研究見黃進興，〈「學案」體裁產生的思想背景：從李紱的《陸子學譜》談起〉、〈「學案」體裁補論〉，俱收入氏著，《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一九九四年），頁 393-433。

3 胡平生在討論民初復辟派時，清遺老的活動顯然是他注意的焦點之一。見氏著，《民國初期的復辟派》（臺北：臺灣學生書局，一九八五年），頁 52-70。

4 梁、王後來都選擇以自殺的方式來結束生命，兩人殉節在當時都引起騷動。相關討論很多，如林毓生，〈論梁巨川先生的自殺〉，收入氏著，《思想與人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九三年，第八次印行），頁 197-227；Joey, Bonner, Wang Kuo-Wei: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周明之，〈由開明而

兩點的討論可否能代表清遺民整體的心態，其實大有商榷之處。為求避免過度誇大政治所導致的負面影響，同時更注意到廣泛且不為人知的微型清遺民身上，我們必須另外找尋題材來分析這一群人的心態和處境。而劉聲木的《萇楚齋隨筆》內容似乎就蘊涵上述兩項特點。

為了方便進入正題，有必要先將清遺民的歷史現象及特殊性加以說明。毫無疑問，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及成功係近代中國劃時代的大事。此事件所帶來的一項深刻影響是：它推翻了自秦漢以降延續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政治，取而代之地則是強調民主與共和精神時代的來臨。在思想層面上，傳統「家天下」和「忠君」觀念不再成為政治主導力量，反倒逐步被視為守舊的象徵。可是帝制在中國實施由來已久，一旦遭逢現實環境直接的衝擊，尤其使得政治權力的分配產生轉變時，其影響自然不言可喻。除了過去國家以皇帝做為中心的「普遍王權」(universal kingship)崩潰外，⁵另一顯著的現象便係整個社會結構必須面臨重新改造。究竟失去了皇帝這項政治權威後，其他所旁附的社會、文化等規範常軌，又該如何來尋求出路？抑或進行變革加以調適？而當傳統社會及政治秩序歷經解體後，過去帝制中國時期所建立抽象和普遍性的理想價值是否也就跟著崩潰？或者還是能夠保有原先的理解呢？

與上述課題最為密切又饒富趣味的，莫過清遺民的態度，特別是他們的出處。「遺民」的出現是中國歷史非常獨特的現象。環顧世界歷史的發展，中國跟其他民族或國家迥異處，是以改朝換代做為解決治亂最終之道。而每當易代之際，便有少數人為表現對故國舊君的眷戀，往往選擇以自我放逐或反對的方式來對待新朝，於是他們的舉措便被視為「遺民」。⁶歷代有關歌頌遺民立場的詩

保守—辛亥政局對王國維思想與心理的衝擊》，《漢學研究》，11.1 (1993/6): 103-134。

5 Benjamin I. Schwartz, "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World Order, Past and Present,"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276-288.

6 當然這只是籠統地說法，「遺民」的出現在歷代來源和意義上其實不一。中國歷史上最早對遺民的記載，其中的內容和意涵並不明確，或指後裔（如《左傳》襄公二十九年，稱「陶唐氏之遺民」），或指亡國之民（如《左傳》閔公二年，稱「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或稱勝朝舊臣（如《晉書·徐廣傳》：「君為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特別是明清之際，遺民的立場與定義更被深刻地確立起來。例如以前往往和

文極多，特別到了宋代以後，一方面由於程朱理學思想的發達，強化了「夷夏之防」觀念，另一方面也因來自征服王朝的侵逼下而更形鞏固。關於宋元、明清之際遺民出處及抉擇，向來就是學界研究的熱門話題。⁷但必須指出：清遺民是研究中國遺民歷史裡比較特殊的例子。他們忠貞的對象，卻是我們向來所熟知的「滿清異族」。由此得知，清王朝塑造出來的文化意識形態，其影響層面和程度顯然超出我們以往的理解。⁸即就種族的立場來說，在歷經將近三百年統治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狹義種族主義看法可能要到清季才重新浮現，特別是二十世紀初革命黨的宣揚後而風起雲湧。至於政治道德的觀點，有關儒家思想中忠節觀念的「闡釋架構」，確實也對清遺民無法提供足夠答案。對於此一

「逸民」一詞混淆未清，清初便在士大夫間有了激烈的討論。歸莊（1613-1673）在《歷代遺民錄》序便聲稱「懷道報德不用於世者，皆謂之逸民；而遺民則惟在廢興之際，以爲此前朝之所遺也」，將兩者區分開來（語見氏著，《歸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卷三，總頁 170）。有關遺民的來源和定義，可詳參何冠彪，《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一九九一年），頁 102-105；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頁 257-289。

⁷ 這方面研究，早期如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北京：三聯書店，二〇〇一年）等，即為享譽學界的大著；近年的專著除上述趙園外，還有顧俊，《南宋遺民劉辰翁之研究》（臺北：木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余英時，《方以智晚節考》（臺北：允晨文化有限公司，一九八六年）、周全，《宋遺民謝翹及其晞髮集研究》（臺北：復文圖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方勇，《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年）、謝正光，《清初詩文與土人交遊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等，其餘論文甚多，茲不贅述。

⁸ 近來西方學界對清朝的文化和種族問題，引起相當激烈的討論，出版的專書也很多。如 Evelyn S.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amela K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Edward Rhoad,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等。相關討論則見 R. Kent Guy, "Who Were the Manchus? A Review Essay," 與 Sudipta Sen, "The New Frontiers of Manchu China and the Historiography of Asian Empires: A Review Essay," 兩文俱在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1 (February 2002): 151-164; 165-177.

心態和現象，我們又該如何進行解釋？⁹

清遺民議題之所以呈現豐富意涵，除了來自歷史上種族和政治問題外，當然也跟近代中國遭受西方衝擊和影響有著密切地關連。更確切說，這群昔日清廷身居朝官的臣民，他們如同革命黨一樣，目睹了清季中國日益危亡的頹勢，都積極謀求救國興邦的辦法。隨著清帝遜位，許多人紛而尋求出路，或投效新政權，或淡出政治舞台另謀他途，然而他們當中有些人卻選擇效忠清室做為亡國遺民。這些清遺民不只是要面臨朝代的興亡鼎革而已，同時在由「臣民」被迫成為「國民」過程中，還須承繼三項問題。第一是中國從傳統邁向現代，尤其晚清以來各項政治、社會制度歷經改革後所造成的衝擊。第二是對中西文化的看法。特別在民國成立以後，這批擁有舊學基礎的士人須面對來自新文化和新學家的挑戰。最後則是前述種族觀及文化認同的問題。此三方面壓力或隱或現地從清季起已蔚為風潮；到民國建立時，更如洪流般一波波銳不可擋。這也充分顯現清遺民所遭遇問題固然與過去有所不同，非但超乎宋元、明清易代之際士人，而且在心理與處境上勢將愈形複雜。要處理如此課題，至少需一本專書，當然絕非本文所可釐清。但本文要討論的劉聲木《萇楚齋隨筆》，卻提供極佳的視角做初步探索。

二、《萇楚齋隨筆》主旨和思想資源

無論生前或死後，劉聲木的事蹟一直都未獲重視。一九四〇年日人橋川時雄（1894-1982）在編纂當時中國文化教育界的人名錄裡，只簡略提到劉氏學術專長，說他和胞弟劉體智（1879-1963）兩人都精通金石古物之學，¹⁰至於其他

9 錢穆（1895-1990）在〈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及續篇二文曾就舉劉基（1311-1375）、宋濂（1310-1381）等人在元末明初的文章內容解讀，發現身處元代異族統治下的士大夫們對蒙古政權的看法，其實並非我們原先既存那麼強調漢族本位的立場和成見，而且歷經變統後這群士大夫對明太祖的觀感，也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友善。不過，與清遺民的現象相較起來，錢穆所稱明初功臣，他們的普遍態度似乎還無具備「遺民」的心態。這兩篇文章均見於氏著，《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臺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二〇〇〇年），頁 84-185；186-216。

10 《中華文化界人物總鑑》（北京：中華法令編印館，昭和十五年〔1940〕），頁 691。

內容則付之闕如。後世之人對劉聲木的印象，也泰半以文獻學家的眼光目之。¹¹而劉氏為人通曉的著作，更僅限於兩部有關桐城派文學之書，¹²與《萐楚齋隨筆》而已。

不過如果我們瞭解劉聲木家世背景，就不難發現他的家庭與晚清政局之密切，亦能從中得知他撰作《萐楚齋隨筆》的原始動機。劉氏原名體信，係安徽廬江人，出身於一八七〇年代末期的達官之家。他的父親是清末四川總督劉秉璋（1826-1905）。劉秉璋原來出身淮軍，曾任李鴻章（1823-1901）幕府麾下客卿，是晚清中興名臣，曾先後為平定太平天國及捻亂屢立戰功。《清史稿》和《清史列傳》均有劉秉璋傳。¹³年輕的劉聲木即因父親職務關係，經常接觸到湘、淮兩軍將領；又由於劉、李兩家多聯姻姪，故劉氏著述裡往往涉及李府和淮軍秘聞。除這部筆記之外，其胞弟劉體智廣受注意的《異辭錄》，¹⁴內容同樣亦多及於此。

儘管《萐楚齋隨筆》提到晚清湘、淮軍事蹟甚多，但由這部書的序來看，劉聲木在資料上的準備顯然歷經了極長時間。該書序言是撰於一九二九年五月，然而作者自言十二、三歲時「即性喜塗抹」，十八歲又自鐫一格字板，專供抄錄之用，¹⁵可知早自清末時他便有意留下各方面將來撰述的材料。從體裁來說，《隨筆》頗有效習洪邁（1123-1202）《容齋隨筆》、顧炎武（1613-1682）《日知錄》之意，先後以「續筆」、「三筆」、「四筆」等方式陸續剪裁完成，其中一

11 鄭偉章，《文獻家通考》（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九年），頁 1489-1491。例如在《隨筆》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的「前言」部分，便說作者通曉目錄版本、金石之學，對學術源流、著述體例所知甚多。不過對清代筆記甚有研究的張舜徽則認為作者學無本原，因此《萐楚齋隨筆》中內容頗多謬誤，「《隨筆》、《續筆》差勝，自《三筆》以下，則多拼湊之辭。其意蓋在貪卷帙之豐盈，未及求內容之精實，宜其膚濫乃爾。」見張舜徽，《清人筆記條辨》（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一年），卷十，總頁 401。

12 這兩部書即是十二卷的《桐城文學淵源考》及四卷的《桐城文學撰述考》（合刊本見臺北：世界書局，一九七四年）。

13 趙爾巽等纂，國史館校註，《清史稿校註》（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九年），卷四百五十四，列傳二百三十四，總頁 10515-10516；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卷六十一，新辦大臣傳五，總頁 4837-4842。

14 劉體智，《異辭錄》（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第二次印刷）。

15 《續筆》，序言部分，總頁 229。

條條讀書筆記內容其實互不相涉，只是偶有穿插，似乎難理頭緒；可是值得注意是《隨筆》雖於民國出版，卻時刻透露出遺民的想法。首先通觀該書，屢稱清朝為「國朝」、「我朝」，而對太平軍、捻軍則以「粵賊洪逆」、「髮匪捻逆」等反動角度視之。當然後者的稱呼與劉氏的父親是淮軍將領有關，不過亦可知他係以清室的立場做為出發點。其次是《隨筆》不時表示對殉清臣民的崇敬，甚至希望經由抄錄下來傳聞，以提供日後編寫清遺民傳記的材料，¹⁶並表彰他們是「完人」，可見劉聲木心繫清室而自許為遺民的。¹⁷從以上兩點看來，近人張舜徽將此書列為清人筆記，¹⁸而不以出版的時間視為民國著作，並非無見。

有關《萇楚齋隨筆》宗旨，書中有數次提及。大體而言，《隨筆》最初撰作原意在彰顯禮教德行，尤其忠孝與婦女貞節更是強調的重點所在。譬如談到徐筠亭〈菜堂節錄序〉裡言明「正倫理，端心術，厚風俗之旨，未嘗不存乎其中」，劉聲木說該書「頗與予撰筆記之意相合」。¹⁹而在說明張廷驥《不遠復齋見聞雜志》的意旨時，則更將此書和自己的筆記略做比較：

綜其大旨，意在表章臣子忠孝，婦女貞節，冀以復禮教之倫，為興觀之助。用意頗與予撰《萇楚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相類，惟予書多考證，應入子部雜家雜考之屬，此則參以小說家言。然筆記體例至廣，苟非離經畔道，原可各尊所聞，……況當此穢濁時世，仍欲以禮教挽回已溺之心，已如麟角鳳毛，曠世難逢矣。²⁰

16 如談到王世忠、張曾疇等清遺民，從讀他人詩鈔而得，「故記之於此，以冀後來者有所採輯焉」（《隨筆》，卷八，總頁 174）；稱林紓（1852-1924）則謂「將來《遺民傳》中，定可高置一席」（《隨筆》，卷十，總頁 213）；又記李寶治（1864-1919）事蹟說「茲復記之於此，使他日為《遺逸傳》者有所考焉」（《五筆》，卷六，總頁 1011）。

17 譬如劉聲木嘗自比為南宋張炎（1248-約 1315），說自己「生逢光宣之間，目擊時事日非，將亡之兆而憂之也。國變後，又顏其室曰『蘭芝室』，取南宋鄭所南思肖於宋亡之後畫蘭以見意，國朝徐枋俟於明亡之後畫之以見意。」（《三筆》，卷四，總頁 547）。

18 《清人筆記條辨》，卷十，頁 401。

19 《五筆》，卷一，總頁 896-897。

20 《四筆》，卷六，總頁 807-808。

劉曾感嘆「禮義廉恥先亡，國未有不亡者也」；²¹清室鼎革，在他看來正是來自禮教淪喪的問題，所以宣揚禮教德行遂為本書主旨，跟劉聲木目睹亡國不無密切關連。

釐清劉聲木個人「遺民」心態與著書主旨後，不可避免地需要進一步瞭解他所根據的思想資源。對和劉氏同為一八七〇年代出生的「後鴉片戰爭世代」知識階層來說，他們所掌握「知識倉庫」(stock of knowledge) 顯然遠較道光年間未受西方船堅砲利刺激的士人豐富。²²即就《隨筆》裡引用的資料來看，劉氏平日讀書不可不謂相當廣泛，約有幾項主要來源。其一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下簡稱《提要》)。《四庫全書》第一部纂修完成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該部圖書幾乎蒐羅了清初以前經、史、子、集各類書籍，是近世中國最為完備的文獻，也是清代圖書重要的功業與文化活動之一。特別在編成以後，總纂紀昀(1724-1805)等人曾撰寫《提要》，目的在綜覈歷代學術的源流，並考訂其中糾謬。從正面意義來看，《提要》適切地舉出各家學派學說的差別；但以負面角度而論，《提要》無異也等同幫助乾隆箝制了士人的思想和活動，同時強調定於一尊且鞏固政權的功能。²³

21 《隨筆》，卷四，總頁 72。

22 「知識倉庫」指的是人類所有生活世界和活動的認知所儲存之處。這些認知跟「思想資源」不同在於：它是屬於生活化的資訊，和環境關係密不可分；有的是來自固有的傳統知識系統，也有外來的事物，形成人類對世界萬物的瞭解。譬如電燈及其使用，如此生活化的物品未必屬於思想資源部分，但卻是我們日常生活所需的。可是要瞭解「電燈」此一詞彙及功能，並將它儲存在「知識倉庫」之中，才能懂得去使用。而「知識倉庫」建立的目的就是為了以便因應外在各種情境與狀況。此概念是借自 Alfred Schutz and Thomas Luckmann, *The Structures of the Life-World*. trans. by R. M. Zaner and H. T. Engelhardt, Jr. (Evanston: 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01。毫無疑問，近代中國的士人接受西方各種思想制度，大致是光緒戊戌以後始漸成風氣，然而在此之前，經驗世界裡生活的「知識倉庫」已逐次建立，如民主思想的面貌即是一例。關於這方面的討論，詳見潘光哲，〈近代中國「民主想像」的興起（1837-189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二〇〇〇年）。

23 《四庫全書》對清代文化活動及思想控制，請見 R. Kent Guy,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57-200；而紀昀的生平及其編修《四庫全書》討論，可參考張維屏，〈紀昀與乾嘉學術〉（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8），頁 1-4；77-99。

劉聲木在《隨筆》中屢次提到《四庫全書》及《提要》，認為《四庫全書》卷數豐饒，正足以顯現清朝文治之功，²⁴而他本人更係深受《提要》的影響。只要任意翻閱《隨筆》內容，我們都不免要驚訝劉聲木是多麼倚賴《提要》來進一步探索浩瀚的中國古籍。劉氏曾指稱《提要》和《四庫簡明目錄》，「宜家置一編，奉為經法」，²⁵他自己年少時因為篤信張之洞（1837-1909）之言，相信「《四庫提要》為讀群書之門徑」，且時時刻意注意文獻目錄之學，案頭常置相關的書籍。²⁶透過劉氏例子我們可以想見，在清季張之洞《書目答問》（一八七五年出版）尚未風行以前，《提要》或許誠如十七世紀歐洲的百科全書一般，是清代中國知識階層掌握傳統知識學問的學習指南，這幾乎為時人之共識。

但需指出，這些「書目」、「提要」書籍對劉聲木來說，並沒有具備西方「啓蒙」的特色，它毋寧還是強調士大夫的綱常倫理思想。《提要》裡有關對孤忠勁節、褒勵故臣之誼的內容，都被劉聲木一一點出。無論是劉辰翁（1231-1294）《須溪集》，劉聲木說該書「於宗邦淪覆之後，瞻懷麥秀，寄託遙深」；還是汪元量（約 1241-約 1320）《湖山類稿》、《水雲集》「記亡國之戚，去國之苦，間關愁歎之狀」；或郭鈺（1316-？）《靜思集》「目擊時事阽危之狀，言之確鑿，每多愁苦之詞」等，我們看到所引之書，多係宋元兩代之人作品。²⁷

其次《隨筆》引用較多的書目是時人文集，尤其是清中葉以降的桐城派文學著作。這固然與劉聲木長期關懷桐城文學的研究有關。如眾所知，桐城古文多有「文以載道」的特色。劉聲木曾謂文章目的在於鼓舞天下士人，無論章回小說或稗官野史，²⁸只求要能中庸勸懲之旨。也就是說，劉氏重視的是文字教化人心的功能，因此在學術立場上，他每每屢言宋學，尊崇程朱，反對漢學考

24 《隨筆》，卷六，總頁 132。

25 同前書，卷三，總頁 65。

26 《五筆》，卷九，總頁 1075-1076。張之洞語見氏著，《輶軒語》，語學第二，收在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十二冊，總頁 9791。

27 上引俱見《四筆》，卷二，總頁 708-711。

28 如稱李伯元（1867-1907）之小說為「戒嫖、戒賭、戒交匪友之教科書」。《隨筆》，卷三，總頁 60。

證，《隨筆》裡隨處摭拾可見。第三部分來源為清季民初的報紙，如《申報》、《時事新報》、《大晚報》、《東南晚報》、《芻言報》，及雜誌如《國粹學報》、《醫學世界》等。劉聲木記載這些報刊內容多和時事有關，而他採擷的標準是和自己的看法相符者，也充分說明了二十世紀後報刊所形成的傳播及輿論力量。

從思想資源的角度來看，劉聲木引用的書目適切地反映其「歷史記憶」來源。特別關於明季野史及士人文集，非但在《隨筆》中反覆地被使用，劉還曾表達想要編目之意。²⁹這裡所反映的心態值得大書特書。對清遺民來說，政權鼎革的挑戰使得他們嘗試從歷史中尋求發聲管道，在體驗新時局變化的情境之下，清遺民不僅消極地「援古傷今」，還要試圖要從舊的材料裡找到因應辦法，以建立自己生命的意義。這樣「發明傳統」(inventing tradition)固是人類歷史上經常共有的現象，³⁰但對清遺民而言特別深具意涵。劉氏《隨筆》對明屋易社的因果似乎有著一套獨特的解讀。他不斷地強調世風學術終將影響人心，而明季士人風氣正是造成這場鉅變的主因。例如劉氏曾斬釘截鐵表示：「歷代士習之壞，未有如明萬曆以後之甚者也」。從明季士人文集裡，劉聲木看到他們動輒媲美道德與周公、孔子並齊，又自比詩文如司馬遷、杜甫，認為他們態度狂妄，是「文字中之盜賊」。非惟如此，劉氏還屢屢指稱公安、竟陵諸詩派「可謂妖妄變換極矣」，遺毒更甚於流寇，為明亡之由。³¹而反觀《提要》也對明末王學多所批評，³²顯然劉聲木看法是與其沆瀣一氣的。

然而，何以這些歷經禁毀不存的明季士人文集，雖不見於《提要》，而卻一再地為劉聲木所援用和強調？這裡我們不得不提到清季日本對中國的關係及影響。如眾周知，近代中國與日本有著愛恨交織的情結。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之戰，不僅造成兩國在亞洲的地位逆轉，也是促成後來雙方往來密切的要因。特

29 《隨筆》，卷十，總頁 210-211。

30 Eric Hobsbawm,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 in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6.

31 相關引文俱見：《隨筆》，卷三，總頁 57-58；同書，卷四，總頁 71-72；同書，卷五，總頁 105-106；同書，卷六，總頁 119；《續筆》，卷四，總頁 310。

32 《隨筆》，卷五，總頁 108；《續筆》，卷七，總頁 383；《三筆》，卷八，總頁 647。

別在戊戌以後，中國西化主張改以向東鄰取經，造成大量青年學子留學日本的風潮。清末留日學生對於近代中國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一方面促成日後革命的禍因，另一方面也汲取了來自日本的「思想資源」與「概念工具」。³³劉聲木同樣也帶給我們若干例證。從《隨筆》內容看來，劉氏時常不經意透露出來自日本的影響。譬如隱約地推崇日人尊孔，乃至他們的尊君愛國表現等。³⁴關於明儒顧炎武的遺佚書信，劉更從《國粹學報》摘錄而來。³⁵眾所周知，《國粹學報》雖是在上海發刊，但「國粹」此一名詞和風潮實際上卻承襲自日本。³⁶藉由劉聲木採集顧炎武佚信之例可知，日本顯然保存了不少清代所禁毀的書籍；他更臆測明末的禁書古籍流入東瀛，與近世種族革命之說的流傳有密切關係。³⁷《隨筆》種種內容跡象都可以窺見日本對近代中國的影響之大，而像劉聲木般的遺民實際上也和清季的革命黨一樣，共同接受著來自日本的思想資源。

瞭解劉聲木《隨筆》的思想資源後，以下我想針對這本書所反映出來的各項觀點，從「風俗」面向來探析劉氏對當時中國三綱和社會秩序看法，以及其中所透露出來的心態。

三、三綱觀與社會秩序

戊戌維新（1898）以後，中國知識階層的思想經歷了明顯地變化，那就是：學習西方形成日常行事的主要準則，而傳統中國裡原先的制度和價值，如今都

33 對於近代留日學生的研究，以下著作值得參考：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啓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七五年）；嚴安生，《日本留學精神史：近代中國知識人の軌跡》（東京：岩波書店，一九九一年）等。至於日本對清末中國整體影響，不妨逕見：Douglas R. Reynolds, *China, 1898-1912: the Xin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王汎森，〈戊戌前後思想資源的變化：以日本因素為例〉，《二十一世紀》，45 (1998/2): 47-54。

34 《隨筆》，卷五，總頁 96；《續筆》，卷三，總頁 298-299；《續筆》，卷四，總頁 308。

35 《續筆》，卷七，總頁 386-387。

36 國粹學派和日本的關係，鄭師渠已做了初步地討論。參見氏著，《國粹、國學、國魂：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二章，頁 31-58。

37 《續筆》，卷五，總頁 349-350。

成為明日芻狗，再也不能適應現實的需要。這樣心態轉變中最明顯的例證，便是既有的三綱倫常、親親尊尊等價值觀，開始受到衝擊，逐步被現代社會裡民主平等的觀點所取代。如此結果一方面導致以傳統綱紀作為維繫的帝制面臨即將崩潰的命運，另一方面則使得禮制秩序呈現破產危機，反傳統禮教的口號漸趨白熱化，成為日後民初「五四」之先聲。面對著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種種轉型，除了積極尋求國家富強與民族生存之道外，最令知識階層格外產生特別的感受是：隨著時代日與俱進，那些傳統的禮教和政法美俗卻似乎因而要退化淪滅。如此的危機意識一步步侵逼、深化，尤其係對受過傳統教育薰陶下的讀書士子而言，社會和制度愈是歷經變革，後果及環境則是愈難以讓他們適應自處，所以便痛心疾首地逕斥風俗淪喪。

前面已經提到，根據劉聲木說法，《隨筆》全書的主旨旨在正人倫、立規範。他對晚清以降風俗的嬗變尤感憂忡，因此希望透過撰書來表彰忠烈節義。儘管認定傳統美俗沈淪亟需挽救並非劉聲木個人獨特的主張，但對傳統中國的知識階層來說，「風俗」與其說存在於每個人對現實環境的瞭解，不如說是對其秩序的看法。即言之，認定風俗「沈淪」可視為知識階層自己對社會秩序呈現不安的態度。歷代的知識階層都有過類似的說法，顧炎武也曾在清初發出慨嘆，表示風俗美習不再。³⁸我們從這一面向可知，劉聲木看待民初社會風俗轉變，同時也反映出清遺民的認知，及他們跟社會環境間有著緊張的關係。

倘使細讀劉聲木《萇楚齋隨筆》各條內容，我們便不難找出在這林林總總的文字當中，似乎風俗的淪喪可以從幾項主要議題歸納起來。這些議題分別是禮教、教育、婦女地位、男女關係及孝道，而都逕自牽涉到三綱倫常關係。它們體現了劉聲木的不滿之聲，也說明對維繫民初社會秩序的構想和藍圖。「萇楚齋」原來是劉聲木的書室名，它取自《詩經》裡〈隰有萇楚〉三章之義。該文原意為感嘆苛政重稅，人民不堪其苦之意。³⁹劉氏則引伸朱熹（1130-1200）的

38 《顧亭林文集》（臺北：新興書局，一九五六年），卷五，〈華陰王氏宗祠記〉，頁 7；最近日本學者岸本美緒敏銳地提到「風俗」做為觀察歷史中集體心態研究。詳見氏著，〈「風俗」與歷史觀〉，《新史學》，13.3 (2002/9): 10-15。

39 《三筆》，卷四，總頁 546；金啓華譯注，《詩經全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

註解，認為家庭裡男女如能恪守分紀，對國家的興亡影響甚鉅。⁴⁰在劉聲木的規劃裡，三綱倫常對國家內外而言，幾乎是一體均霑、牽一髮而動全身的。

(一) 禮教

第一項「禮教」議題是劉聲木視為清室喪亡的原因。他把理由歸諸到以學習西方作為目標的「新政」改革，認為正係開啓了道德墮落敗壞之主因。眾所周知，為了因應西力衝擊及現實的需要，清廷在最後十年的統治之中，曾先後進行大規模的體制內改革，內容包括有設立新式學堂、農工商部等機構。這些新成立的制度和組織，目標是為了追求國家的富強，不過在劉氏看來，「事事專重改革」的變動終究造成了名器浮濫，進而促成綱紀無常的風氣。他舉《左傳》云「國將亡，必多制」為例，認為清朝所以滅亡，其中最關鍵的因素就是由於紛更舊制，致使名教綱紀蕩然的緣故。他始終認為對舊制應抱持保存追遠之義，不當盡廢。⁴¹

劉聲木還聲稱清季名器浮濫結果加強了士大夫習氣腐化。蓋因新政機關林立，高官厚祿遂為尋常庶民百姓唾手可得。⁴²在劉氏看來，朝廷命官地位既然崇高，代表著讀書人歷經努力不懈後的成果，然而如今官祿易得，朝士便視怠事瀆職為常理。職是之故，士習自然久浸淫在忼歲惕日之中。如前所述，劉氏書裡不斷反覆講述歷代衰亡，與士大夫習氣有著密切地關連，甚至產生了決定性的因素。可見對劉氏來說，士人以學術維護名教禮秩，其實是最為要緊的事。他說：「學術之禍天下，其影響於人心風俗者，至捷至大，至久至遠。有國家者，宜有以深思熟慮。」又舉北宋士人恥於廉潔，不待異族入侵便已瀕臨滅亡之境，謂：「我朝之易社為屋，其情形與北宋極相類。自引夫己氏（案：殆指袁世凱）後，已覺綱紀蕩然，倫常盡變，不待宣統辛亥以後，早已潛移默運於

八四年），頁312。

40 《五筆》，卷六，總頁895。

41 《續筆》，卷二，總頁260。

42 同前書，卷四，總頁312。

此，名教掃地矣。」⁴³在另一條筆記當中，我們也看到他以繆荃孫（1844-1919）提到內府《永樂大典》遭竊一事，痛批清季士人廉恥道喪，禮教淪背，說明士風不再，早已埋下清社易屋的種子。⁴⁴

（二）教育

仔細推敲劉聲木分析清亡之因，可以深覺他對清季推行新政實際是心存惡感的。這也是在民國成立後清遺民共同普遍的心理現象。新政在清末庚子以後推展，曾經引發當時朝野官員和士人的爭議。其中一項主要原因在於新政改革取士用才標準是配合新式教育來推展的；⁴⁵而所選任的人才並非原先通過傳統科舉教育下的士人，卻是另一批留洋學生或在新式學堂裡接受教育的知識分子。這群被稱呼為「洋進士」與「洋舉人」的新知識階層，於是成為朝中新貴，⁴⁶結果進而促使一九〇五年科舉制度廢除，阻礙了既有管道下傳統讀書士人晉身宦途的機會。和劉聲木同時代的傳統士人面對這樣的衝擊，無疑對這些學習新式教育的知識分子是懷有敵意的。劉嘗謂「光緒初年及中葉，國朝崇尚科舉，名器猶未致盡濫如末年也。」⁴⁷我們還可自劉在一八九九年（時年二十二歲）給姪兒的覆信裡窺見一二。他說：

當今之世，綱常名教已掃地無餘，賢以後必須於道德上極力用功，則所成就為尤大且遠。……西文雖為當今投時利器，然如果有人

43 《隨筆》，卷四，總頁 72、81。

44 同前書，卷三，總頁 49-50。

45 Wolfgang Franke, *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53-67。關於清季新式教育和新政、社會變遷之間的討論，Sally Borthwick 和桑兵曾進行過這方面研究。見：Sally Borthwick,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Er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上海：學林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二書。

46 徐珂編撰，《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第四冊，譏諷類，〈洋進士 洋舉人〉條，頁 1678-1679；Y. C. 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6), pp. 61-71.

47 《續筆》，卷九，總頁 432。

立身端正，文筆條暢，辦事精勤，可患無出人頭地之一日，豈必非讀西文，遂無立足之地乎！⁴⁸

拿道德文章和學習西文做為對照相比，認為只要前者便有「出人頭地之日」。據此信推知，他對學西文、習新學的士人表示極為不滿的態度，甚至暗指這群新知識分子和綱常名教掃地有關。同樣在《隨筆》裡記載當時的輿論，也對留學生有諸多嘲諷之處。⁴⁹

新式教育引發禮教道德淪喪，在清季議論時政誠然是項亟為矚目的焦點。曾在杭州詰經精舍主講三十餘年的俞樾（1821-1907），便對開設新式學堂抱持反對的態度。⁵⁰當時各式學堂設立，有所謂的女學堂、僧學堂、伶學堂、妓學堂，殆見流風熾盛，為人所譏。胡思敬（1870-1922）稱咸豐、同治年間，捐官風氣儘管盛行，但總會遭到鄉里間所不恥，可是今日則不然：「諸生焚筆棄硯，輾轉謀食四方……科舉廢，學堂興，朝局大變」，據說尚有考試以〈士子改裝游學比之西人變服傳教〉為題，竭盡揶揄能事。⁵¹教育內容轉變造成整個社會心態上的變化，我們還可以從另外一位身處山西內地的舉人劉大鵬（1857-1942）所見所聞，看到傳統舊學士人正因科舉制的廢除，而其地位開始產生轉變，處境也更形艱困。⁵²必須注意是，劉大鵬在他的日記裡不時流露出新政不啻為「擾民」，也促使了世道不靖，人心思亂的後果。⁵³在士風轉變之下，新學非但未能培養學生的倫常與道德觀，反而促使「凡入學堂肄業者，莫不染乖戾之習氣，動輒言平等自由，父子之親，師長之尊，均置不問」；⁵⁴更重要的是，那些崇洋

48 《四筆》，卷十，總頁 876。

49 例如暗嘲留學生不知中國史地，見《四筆》，卷四，總頁 765。見劉聲木引《時事報》中〈擬考試人員上唐寶鍔書〉所云。

50 《五筆》，卷一，總頁 913。

51 《國聞備乘》（重慶：重慶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頁 160、175-176。

52 《退想齋日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特別是日記中 1895 年以後到 1905 年間的記載。羅志田曾根據此書做過初步的討論，見〈科舉制的廢除與四民社會的解體〉，收入氏著，《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頁 161-190。

53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1903 年 2 月 23 日條，頁 120。

54 同前書，1907 年 9 月 13 日條，頁 162-163。

反古、議論時政得失的舉動，同樣孕育了排滿的思想。⁵⁵到了進入民國之後，倫常綱紀就更形蕩然，世風也日趨低落：

辛亥大變以來，倫常全行破壞，風氣亦更奢靡，禮義廉恥望難講究，孝弟忠信，何人實行，世變日亟，岌岌乎其可危！⁵⁶

所以這一連串毫無預警的激烈變化，對本來信守著傳統精神與價值的舊學士人來說，只能把原因歸諸於古道不行，固有禮政良俗不再。劉聲木所撰作的《萐楚齋隨筆》，正可自這一角度來思忖。正因為如此，《隨筆》裡也到處可看到他對教育的理想和標準。例如劉氏認為教育攸關風俗的發展，主張近世人們推行教育時分為德育、智育、體育三類，事實上德育尤為重要。⁵⁷而在一九二四年張作霖（1875-1928）強調學堂要講道德、讀孔書時，劉聲木更是直誇讚此項看法「真當今學堂之藥石，家庭之龜鑑也。」⁵⁸

（三）婦女地位

劉聲木第三項議題是關於婦女地位。據陳東原的看法，中國婦女的角色，一直要到甲午戰後才有鉅大的轉變。⁵⁹在傳統社會裡，女子在生活方面大抵上是附屬於男子的；迄至清季戊戌維新改革開始，主張興女學、反纏足等運動湧起，甚至各式各樣增進婦女知識的團體紛紛出現，蔚為風潮。加上革命黨人（如秋瑾〔1875-1907〕的個人形象）推波助瀾，可以說當時知識界對提高婦女地位的看法，並無軒輊。《隨筆》之中也有多條筆記涉及對女性形象的描述，顯然受到時代影響。由此可見，婦女作為論述（discourse）的中心，不但是清季以來推行啟蒙運動志士藉以移風易俗的焦點，⁶⁰也是清遺民在民國後極力爭取言

55 同前書，1906年4月14日條，頁150。

56 同前書，1913年2月18日條，頁177。

57 《隨筆》，卷六，總頁122。

58 《三筆》，卷四，總頁550。

59 《中國婦女生活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六〇年），頁314-315。

60 Louise Edwards, "Policing the Modern Woman in Republican China," *Modern China*, 26.2 (April 2000): 115-147。「五四」前後「理想的母親」角色尤其成為反抗傳統政治的著力點，Sally Taylor Lieberman, *The Mother and Narrative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論的一處園地。

才德兼備的「良妻賢母」可以說是劉聲木對理想女性所揭橥的標準。他嘗在《隨筆》多處舉出清朝通詩達文的女性，指稱若是「得嬌妻美妾，比之高官厚祿，更屬不易」，⁶¹並屢次言及有關婦女年譜的著作。⁶²除了表達女子才德應受重視外，劉氏也積極為歷史上的女性角色重新尋求一新定位。例如提到唐代楊貴妃時，劉氏認為貴妃不獨豐於色，而且更富於才，觀其〈阿那曲〉的文采，即可知唐玄宗之所以會「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徇非無理。⁶³劉氏認為婦女扮演吃重的角色，他還暗喻慈禧是導致清亡因素之一。⁶⁴此外，在一本模仿《列女傳》體裁而題名為《蘭閨寶錄》的書中，我們得悉婦女的形象被做了若干劃分：分別是孝行、賢德、慈範、節烈、智略與才華。劉聲木對此一女學的標準及分類方式，大體抱持贊同的看法。⁶⁵然而這和一九〇七年清廷學部所擬的師範學堂女子章程三十九條，內容有著異曲同工之處。按照章程所訂定的原則，是以推行「良妻賢母」視為興辦女學的最終目標。⁶⁶因此可知，對於婦女角色的看法及定位，劉氏基本上還是以傳統的「三從四德」為出發點。

劉聲木歌頌婦女「三從四德」形象，當然和他尊崇程朱之學的背景不無關係。

(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8)對此一課題曾有詳密的研究。

- 61 《隨筆》，卷三，總頁 55。例如舉太原張佚生有七女，皆能頌詩；又婦女王貞德能夠博通經史，跨馬橫戟，每射必中，兼精算法，旁通醫卜壬遁之學。見《隨筆》，卷二，總頁 36；《續筆》，卷七，總頁 382。
- 62 《隨筆》，卷七，總頁 156。
- 63 《續筆》，卷四，總頁 305-306。
- 64 《隨筆》，卷十，總頁 208。
- 65 《隨筆》，卷五，總頁 109。在另一本由李桓編的《國朝賢媛類徵初編》也以孝、敬、慈、節、烈、義為「六德」，劉聲木也特別標舉出來，見《四筆》，卷十，總頁 889。
- 66 〈女子學堂學部奏詳議女子師範學堂及女子學堂章程摺〉，收入《大清法規大全》(臺北：宏業書局，一九七二年)，頁 1315。「良妻賢母」論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是遠東亞洲各國對於婦女角色定位的一項普遍共識，這當然有其歷史背景因素。中國最先提倡者可能為梁啟超 (1873-1929)。1897 年梁在《變法通議》裡高呼「興女學」，認為過去只有「慈母」，而無「賢母」，此後引起中國對於婦女和救國問題許多討論。相關研究見瀨地山角、木原葉子，〈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良妻賢母主義〉，《中國—社會と文化》，4 (1989/6): 277-293。

連。如前已述，劉氏撰寫桐城文學研究目的在彰顯桐城派諸人；我們自然可以推知他對清代桐城當地特重禮教風俗，並且強調貞孝節義行為，尤其頌揚。近人曾經指出：有關清代的室女守志、殉婦殉夫等道德極端主義表現，桐城之風氣最為興盛，無論清儒方苞（1668-1749）、姚鼐（1731-1815）等皆力主之。⁶⁷極為明顯的，劉聲木的立場似乎也以此為基調。李國英（？-1906，李鴻章之孫女）殉節一事即為其例。劉在《袁楚齋隨筆》裡大幅抄錄李氏家書，以彰顯其貞節。李氏的夫婿是在一九〇六年時感染病疫而亡，旋後因立嗣問題，李氏忍辱周折，最後終於確定；然後李氏為表達貞節，決定與夫共生死，故致函給父母翁姑、胞弟姊妹，勸其節哀，之後仰藥以殉。整件事情來龍去脈乍看來只是猶如後來魯迅（1881-1936）所謂「以理殺人」的偶發事件，不過對劉聲木而言卻深具意義。劉說她「洵屬從容就義，視死如歸，凜然足以昭示百世，皎然與日月爭光。巾幘中有此完人，較之李文忠公鴻章、李勤恪公翰章兄弟，無多讓焉」；又謂其遺書裡文字的表達，與「方今世教凌夷，道德墜廢，更屬救時良藥」，⁶⁸可見推崇貞節，其實是和拯救禮教凌夷的目的放在一起。

這樣尊崇婦女貞節德行，無疑也是劉聲木對現實政治環境的另一種心理投射。劉所以認為名節攸關個人聲譽，而婦女的貞操正如同遺民恥事二姓一般，是不容許被輕忽的。他又特別歌頌婦女能知曉君臣之義。譬如嘗舉顧炎武的母親為例，說顧母在「崇禎時，旌表節孝，甲申之變，絕粒以殉」；並舉史可法之妾遭國變，史死後而誓不再適，⁶⁹明顯地將忠君和節烈並視，便可知其意趣。

然而針對現實婦女地位的轉變，劉聲木似乎對民初女學教育頗不為然。他認為現世的女子教育，並非以「孝敬慈節烈義」等六德作為標準，反倒是積極地爭取平等，行為放恣；⁷⁰譬如有關法律方面對於財產分配一事，劉氏顯得有所保留。他的看法是：

67 周婉窈，〈清代桐城學者與婦女的極端道德行為〉，收在鮑家麟主編，《中國婦女史論集第四集》（臺北：稻鄉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頁185-251。

68 《三筆》，卷三，總頁524。

69 《隨筆》，卷一，總頁5；《隨筆》，卷四，總頁78；《三筆》，卷九，總頁660。

70 《四筆》，卷十，總頁889。

慨自世風日下，習俗日漓，女子在室，已有向其父母兄弟迫索奩費，爭奪養贍者。後更進而益上，有與兄弟姊妹併分財產之權。但不知此等法條，為根據中律乎，為效法西律乎，吾不得而知之矣。⁷¹

劉聲木認為現今女子積極爭奪家財，不符固有禮義規範，同時說明女學道德教育不彰，有呈現墮落之趨勢。所以當他聽聞唐文治（1865-1954）遊歷東西洋各國女校，皆設烹飪與洗濯二所，重視婦女家政，就特別心感戚戚，認為「深合聖人修身齊家之道」；反而感嘆「我國不知外國立女校之深心，以何者為急務，徒震於其名，貿然為之，以致所教非所用」。⁷²我們看到劉氏在批評女學教育的同時，不僅援引了既有道德內容外，還取法泰西之例來著力。

（四）男女關係

關於男女社交，劉聲木主張內外和諧關係，認為「婦人齊家，男子治國，內外皆為聖人」，所以社會上的男女關係應該是相助而成。⁷³在劉氏所引《草堂之靈》作者楊鈞（1880-1940）的看法與此相似。楊氏在一篇〈重女〉的文中，提出中國傳統男女地位本屬平等，何來不平之說？楊鈞認為禮經上說夫婦一體，尤能表現其中深意。蓋因自古以來刑法所釐定的範疇，女子的限制獨寬；而夫之尊榮，婦可坐享。過去在家庭生活負擔上，多屬男性之事，婦女只要負責家內雜務即可；今日則由於生活日艱，遂有婦女出外工作情事，是時務權變之所以然。因此，中國「昔時本為重女之國，今日反倡平等之言，事之離奇，無過是者」。⁷⁴劉聲木據此則加以引伸，認為今日敢言離異，強調「婚姻自主」的人，實則背棄禮義之道。其言：

今棄禮義而專言情欲。禮義束縛，可以歷千年而無蔽；情欲相感，

71 《五筆》，卷五，總頁 975。

72 《續筆》，卷八，總頁 399-400。

73 《隨筆》，卷十，總頁 209。

74 楊鈞，《草堂之靈》（長沙：成化書局，一九二八年），卷十六，〈重女〉，頁 4-5。

出於一時誘惑而有餘，是以見〔現〕在離異者日多。⁷⁵

觀劉、楊兩人所言傳統婦女地位的情況，雖然未必盡屬事實，不過可以藉此探究他們的心態。研究近代中國文化思想史的學者大致同意：「五四」知識分子對反禮教運動，實際上充滿著矛盾痛苦的思慮過程。反觀劉、楊之見可知亦復如是。他們也希望在新、舊文化和倫理之間，獲致平衡。然而劉、楊兩人和「五四」知識分子不同的是：他們認為傳統禮義依舊是維繫社會倫常的準繩。不像「五四」知識分子開始日益質疑傳統的正當性，⁷⁶所以有關女學教育和男女社交問題，劉、楊他們自傳統中提出另一套說詞，無非在企圖凸顯古道實行後禮義將在，而今法施行則將背棄禮義，是前者猶勝後者。

（五）孝道

另外，除了婦德外，《隨筆》一書非常重視孝道。關於此一心態與問題所關注的焦點，同樣也反映在倫常關係上。劉聲木聲稱五倫之中，尤以父子關係最為重要，甚至高於君臣關係。如謂：「人未有不孝于親而能忠于君上，有于兄弟，篤于夫婦，信于朋友者」，如何「教孝」成為他心中時常反覆深思的課題。劉氏還曾經嘗試撰寫過《家訓述聞》，企圖挽救綱常倫教。⁷⁷何以劉聲木會特別將「孝」的地位放在「忠」之上？似乎對劉氏而言，民國以後忠「君」已難於維持，「孝」反而成為他認為維繫倫常的關鍵。這裡態度上的轉變顯然與「五四」以後思想

75 《四筆》，卷十，總頁 879。

76 同如近人指稱：二十世紀中國思想的特色是快速地激進化過程。而 Vera Schwarcz 曾區分中國三個知識階層世代，他舉梁啟超、錢玄同（1887-1939）和羅家倫（1897-1969）為例，說明這三個世代之間對傳統態度的差異。梁啟超屬於「飲冰者」，探究中國停滯不前，並企圖系統提出改造中國者；而錢玄同屬於「疑古」，即敢於反傳統甚至與傳統決裂者；羅家倫則屬於「堅定者」，重新闡釋梁啟超輩所提的系統化、而錢玄同卻大加排斥問題。顯然到「五四」一代，反傳統已屬於主流看法。至於劉聲木、楊鈞等人，基本上屬於和梁啟超同一世代的人。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和保守〉，收入氏著，《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臺北：三民書局，一九九一年）頁 213-215, 229. Vera Schwarcz,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 24-25.

77 以上引文均見《四筆》，卷一，總頁 692。

界的心態有關，我們也看到民初三綱觀念的次序產生若干變化。但無論就婦女還是孝道的議題而言，劉聲木可以說基本上幾乎都和民初「五四」之後知識界的看法迥異。所以《隨筆》儘管出版在一九二九年，卻可說是和當時主流意見相左；也無怪乎他會深切批評當時的國學運動，是割裂古書加以解釋訓詁，非合古人之意。⁷⁸

從劉聲木三綱倫常和社會秩序的看法，我們還可以看到清遺民心態，和以往歷代的遺民境況有別。儘管抨擊社會上禮教隳壞或強調綱紀淪喪，都是歷代遺民普遍會出現的言論，然而究竟該如何追求且繼續保持文化傳統，在清遺民而言尤具意義。因為繼續秉持著忠貞節義與政治倫理，對歷代遺民來說，只是有所為、有所不為而已，綱紀倫常並未因此崩解。可是清遺民面臨的境況卻迥異，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換言之，他們的出處非但攸關個人是否保持忠貞而已，並且此一忠貞的價值也一再處於被顛覆的困境。因此，努力高聲疾呼恪守倫常綱紀，在清遺民心目中可說特別深值重視。而且，他們訴諸的理念也和過去有所不同。如劉聲木戲言「家粹」以別於「國粹」，又說「家國一理」，⁷⁹企圖把家／國的關係聯繫起來，非惟說明人心的態度是一體的，也藉此想要陳述家庭倫常正是國家政治具體而微的表現。所以維繫倫常關係對綱紀能否維持有著決定性影響，這是他企圖想要表達的語言。可以看到，劉聲木對維繫風俗是秉持文化遺民的立場：國家既然崩解，無法再維持綱紀，那麼便寄託於家庭之中，即如顧炎武「亡國亡天下」之辨。只不過劉氏對聯繫家／國互喻的努力，我們不禁也聯想到研究法國革命風潮下的王室、國家和家庭敘事結構裡，父親權威、母親角色不容忽視，彼此間竟有著千絲萬縷、複雜糾葛的模式及微妙處境。⁸⁰

四、清遺民的處境及活動

78 《隨筆》，卷一，總頁 7。

79 《續筆》，卷二，總頁 260。

80 Lynn Hunt, *The Family Romanc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留心《袁楚齋隨筆》的記載便能發現，劉聲木經常談到關於歷代亡國之後遺民的撰述及言論。尤其是對南宋、明代與清代遺臣史事，可以說提供了鉅細靡遺相關史料。這固然反映著劉氏個人心理投射和關懷，也涉及清遺民對自我形象如何塑造的問題。

大致來說，原來在清室任官的朝臣進入民國後，地位各有起伏。《隨筆》裡曾有感慨這種「升沈不一」的情形，以「高者入九天，低者入九淵」來形容各自不同境遇。⁸¹而事實上，清遺民的處境呈現了幾種面貌：在積極方面，或奔走聯絡，意圖復辟；或著書撰文，藉以鼓吹帝制。至於在消極方面，則組織社團，進行文學性的活動；或藉詩酒唱和，聯絡同志；或拜謁崇陵，繼續盡忠效忱；或纂史修志，追頌節義。⁸²然則，在辛亥革命這場「國變」之後，卻鮮少有聽聞為清殉身者，尤其以漢臣而言。當時頗有好事者自稱「君在，臣何敢死？寇至，我則先逃」，並將之書於門聯。⁸³其中原因，不只包含了滿漢間種族、文化的問題，可謂相當複雜，而且遺民的態度不一。但無論如何，前述的綱常毀裂及廉恥喪失，是其中要素之一。⁸⁴積極者大多運用權術，另謀政治利益；消極者則泰半是隱姓埋名，喬裝易容，於失去政治伸展的舞台後，轉向地方上文化方面的建設。

劉聲木基本上係屬後者。他充分體認到帝制在世界潮流裡不再可行，⁸⁵但既然君主政治無法續存，那麼肩負綱常倫理的「士」又該何去何從？這使得劉氏開始在歷史與現實的實例中，不斷思量和尋求自己因應之道。從緬懷歷史過去記憶裡，他關注到歷代衰亡之時，總有著詩人文士們藉託諷詠，表達哀怨深摯的詞句；⁸⁶劉氏也尊崇宋亡後在元朝隱居不仕的翁森、真山民、鄭思肖

81 《續筆》，卷九，總頁 430。

82 胡平生，《民國初期的復辟派》，頁 55-62。

83 見徐珂編撰，《清稗類鈔》，第四冊，「譏諷類」，〈君在臣何敢死〉條，總頁 1670。

84 清遺民羅正鈞（1854-1919）曾表達過類似的看法。見氏著，《辛亥殉節錄》（臺北：明文書局影印，一九八五年，收在清代傳記叢刊第六十四冊），總頁 236。

85 《續筆》，卷二，總頁 263。

86 《隨筆》，卷十，總頁 205。

(1206-1283) 等人，更自比爲張炎；⁸⁷又認爲明代不仕永樂朝的龔詡(1382-1469)，顧念舊主之情，是位忠節之人；⁸⁸還稱頌元好問(1190-1257)在金亡以後，屢屢痛宗社淪胥，無力援救，偷生苟活，草間乞食之貞操。⁸⁹除了歷史所提供的經驗之外，現實清遺民的境況與人物也在《隨筆》記錄中到處可見。

關心和自己有著相同處境的清遺民，並隨時留意他們的進退之道，在劉聲木這部筆記裡，斷斷續續地抄錄而佔有相當的比重。但劉氏絕非獨特一例。在民初，即有不少像他一般的遺民進行相同的事業，希望能夠記載這些鮮爲人知的隱逸之士。這些清遺民所能貢獻的就是竭盡所能記錄下志同道合友朋的事蹟，於是乎，過去替人撰寫墓誌碑銘風氣，延續成爲他們彼此努力留下文字的目標，後來還進而擴展到編纂碑傳集。碑傳集的編纂大約始於宋代杜大圭的《名臣碑傳琬琰集》，清道光年間錢儀吉(1783-1850)採摭各家碑志、傳狀及方志爲編，以補國史取材之不足，⁹⁰但到清末民初時更形蓬勃。清遺民裡最顯著的實例就是汪兆鏞(1861-1939)的《碑傳集三編》。據汪氏該書自敘所云，《碑傳集三編》除有訂僞、補遺、參證之功用外，還在於續纂民國以後歿亡而《清史稿》未及備載的遺臣，如陳寶琛(1848-1935)、朱祖謀(1857-1932)和沈瑜慶(1858-1918)諸人，又仿《後漢書》創立獨行傳，蓋有激勵辛亥後松柏歲寒之意，以示崇尚氣節。⁹¹錢鍾書(1910-1998)曾有段極爲精闢文字，說明爲人作嫁的傳記，經常係自我表現，藉此發揮自己情懷。錢說：「你要知道一個人的自己，你得看他爲別人做的傳；你要知道別人，你倒該看他爲自己做的傳。自傳就是別傳。」⁹²在《碑傳集三編》內容裡，我們可以看到大量抄錄下來的墓誌

87 《隨筆》，卷六，總頁 121；《三筆》，卷四，總頁 547。

88 同前書，卷八，總頁 158。

89 《續筆》，卷二，總頁 276。

90 錢仲聯主編，《廣清碑傳集》(蘇州市：蘇州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前言」，頁 1；馮爾康，《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二〇〇〇年)，頁 116。

91 《微尙齋雜文》(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一九六七年，收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八十三輯)，卷二，〈碑傳集三編自敘〉，頁 15-16。

92 錢鍾書，〈魔鬼夜訪錢鍾書先生〉，收入氏著，《寫在人生邊上／人·獸·鬼》(臺北：書林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 8-9。

碑傳，其中有許多正是清遺民藉此相互表彰以及申明一己心跡的文字。

對這些「表明心跡」的文字而言，抄錄碑銘或為人作傳都只是其中一種手法。⁹³不過清遺民藏諸名山的工作，無疑更讓他們尋得安身立命之處；因為追述遺民精神，往往也就隨著在著書的字裡行間，復見一己之志。⁹⁴在民初進行撰述的遺民傳記裡，其中最著者莫過於廣東東莞人陳伯陶（1855-1930）所修的《重修東莞縣志》、《宋東莞遺民錄》、《勝朝粵東遺民錄》等書。據吳道鎔（1852-1936）〈勝朝粵東遺民錄序〉所言，陳氏在辛亥之變後避居九龍，化名「九龍真逸」，因見宋季故墟，頗有異世同感，乃亟欲纂輯宋、明兩代粵東遺民舊事，希冀端正風俗人心，並有傷今思古之餘痛。⁹⁵至於續纂《重修東莞縣志》，陳氏更對於明末袁崇煥（1584-1630）、張家玉（1615-1647）、蘇觀生三傳尤為詳核，蓋皆所以托其心志。⁹⁶

而張其淦（1859-1946）《明代千遺民詩詠》、⁹⁷汪兆鏞《元廣東遺民錄》等著作，便是承繼陳伯陶而來的兩部遺民錄。汪氏自述，宋、明兩代主辱臣死，大義昭然於史乘，然並非元代無之。汪兆鏞自史籍裡尋繹，得出五十餘人，說明元代雖屬「異族」統治，可是君臣之義，萬古常昭，不會因時移世易，致而廉恥不顧。⁹⁸很顯然地，他關注的焦點不在於元朝是否為「異族」，而是人心風俗能否有所繫從。⁹⁹除了陳、汪兩人的著述外，吳慶坻（1848-1924）的《辛亥殉難記》、¹⁰⁰羅正鈞的《辛亥殉節錄》，也記載了歿於革命期間的官吏兵將，作為追懷及端正人心的功用。藉由著書以寓托心志，所得到的另一項影響是：遺

93 關於這一課題非常複雜，無法在此詳論，我打算另外撰文來探討。

94 《五筆》，卷三，總頁 947-948。

95 吳道鎔，《澹盦文存》（臺北：大華印書館影印，一九六八年），卷一，〈勝朝粵東遺民錄序〉，頁 3-6。

96 倫明，《辛亥以來藏書記事詩》（北京：燕山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頁 29。

97 張其淦著，祁正注，《明代千遺民詩詠》（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一九八九年），卷首，自序部分。

98 汪兆鏞，《清汪微尙老人兆鏞自訂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一九八〇年），頁 39。

99 《微尙齋雜文》，卷四，〈與簡竹居書〉，頁 8。

100 吳慶坻，《辛亥殉難記》（臺北：明文書局影印，一九八五年，收在清代傳記叢刊第六十四種）。該書最初流傳不廣，後為金梁增補後刊行，見是書卷首，總頁 5。

民在蒐羅佚事遺文時，無形中對地方文獻與史料的保護、收藏，發揮了極大的功用。舉例言之，吳道鎔甄錄匯集而成的《廣東文徵》，即是收錄嘉慶以來粵人遺著，一方面寄以故國之思，同時也補闕地方掌故軼事。¹⁰¹

這群消極的清遺民，以窮一己精力從事撰述，他們的心志固然是為保存倫常風俗，但亦與讓清帝遜位的袁世凱相互分庭抗禮不無關係。如眾所知，袁氏為撫平清室遺臣之心，於一九一四年三月下令設置清史館，準備「延聘通儒，分任編纂」，並以趙爾巽（1844-1927）為總裁。一時知名的遺老如于式枚（1859-1915）、吳士鑑（1868-1933）、繆荃孫、陶葆廉（1870 前-？）等，先後應聘。¹⁰²袁氏的目的，無疑係籠絡清室遺臣，但也引起諸多反彈。我們看到劉聲木也有類似的迴響。他所屢稱的「夫己氏」，便是暗指袁氏而來。¹⁰³又以明末阮大鋮（1587-1646）為例，言誤國庸臣，猶勝背主求榮者；¹⁰⁴而繆荃孫固然博學，洵屬難得人才，惟助袁氏組籌安會，實所不恥。¹⁰⁵凡此言論，殆見劉氏的態度。

清遺民所具備或塑造出來的隱逸形象，從《萇楚齋隨筆》內容中也能略見一二。劉聲木在筆記裡描述這群清遺民，是一種兼具孤憤、忠義卻又隱逸的氣質，這顯示遺民在民國後與世孤絕的心態，也反映出他們採取何種方式來塑造自我形象。例如倪釗形容自己雖生猶死的處境，曾自輓聯語云：「鶴化恨今遲，八六年戴髮歸泉，碑碣猶題清處士；鶻啼悲路迥，三千里忠魂繞闕，衣冠不改舊遺民」；¹⁰⁶又張祖翼（1849-1917）則在辛亥以後決意不為馮婦，屏居濠湖之濱，閉門讀書；¹⁰⁷林紓本在北京五城學堂主講，「國變」後始盡棄所事，以賣畫

101 吳道鎔，《澹盦文存》，卷一，〈與姚君憲書〉，頁 28-31；張學華，〈誥授通奉大夫翰林院編修吳君行狀〉，汪兆鏞纂輯，《碑傳集三編》（香港：大東圖書公司影印，一九七八年），卷四〇，總頁 2158-2160。

102 金梁，《瓜圃叢刊敘錄》（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一九六八年，收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十九輯），卷一，〈清史稿校刻記〉，頁 21-23。

103 如《隨筆》，卷九，總頁 185-186。

104 同前書，卷三，總頁 63。

105 同前書，卷六，總頁 117-118。

106 同前書，卷二，總頁 32。

107 同前書，卷七，總頁 154。

譯書自給，並託墓誌銘於友人；¹⁰⁸黃葆年（1854-1924）自言辛亥後，以漆室女自處，誓不再嫁；¹⁰⁹梁鼎芬（1859-1919）於辛亥後，作書皆有鈐印，稱己為「本自江海人」，取南朝宋謝靈運（385-433）傷心琵琶別抱之意。¹¹⁰有關清遺民各種描述，令我們想起民初一部模仿《世說新語》的書裡，也有著類似描繪人物的姿態。¹¹¹

清遺民抗拒民國時局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服裝上的變化。劉聲木《隨筆》內容一直對社會上崇奢的風氣頗不為然，因為奢靡潮流終將帶來了道德墮壞，致使僭名時現，綱紀自然無常。所以他看來，「崇奢」和「名器盡濫」兩者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根據劉氏所憶，光緒中葉時社會風氣尚無大變，即以服裝而言，各有階級、身份等屬性不同，殆見社會階層的界線森嚴。¹¹²不過隨著禮制秩序解體，服飾愈趨流行，崇洋而穿著西服始成為時尚。到了辛亥革命爆發，風氣遂產生轉變：

辛亥以前，服西裝者甚少，即有之，亦以中下等人為多，中人之上者不屑為之。九、十月亂熾之時，舉國競以服洋裝為時髦。避亂在滬之遺臣遺民，經濟每多困難，平時出門，僅坐黃包車而已。

時人集一聯云：「革命鉅子綠氈帽，亡國大夫黃包車。」¹¹³

這段話呈現出政治變動帶來文化和心態上的變化，當中有兩處地方特別需要讀者留意：首先，失去政治舞台後的清遺民，他們在經濟方面頓失奧援，生活上多半出現捉襟見肘的窘境。其二從聯語可知，伴隨來自經濟困難及心態上的堅持，清遺民的穿著與時人崇奢風氣、追求時髦的西服打扮顯然有別。

108 同前書，卷十，總頁 212；陳寶琛，〈林君畏廬七十壽序〉，《滄趣樓文存》（陳懋隨自刊排印本，一九八八年），卷上，頁 41；林紹，〈誥授資政大夫鹽運使銜梧州府知府長樂高公墓誌銘〉，《畏廬文集》（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一九二三年），頁 43。

109 《續筆》，卷一，總頁 253。

110 《三筆》，卷一，總頁 477。

111 陳灝一，《新語林》（上海：上海書店，一九九七年）。例如是書卷三，「棲逸」條，總頁 101-104，內有數人即為清遺民。

112 《續筆》，卷四，總頁 312。

113 《隨筆》，卷九，總頁 202。

不少資料顯示，民初許多清遺民的裝扮，頗有表現特立獨行之意。劉聲木自己本有以黃衣黃冠的服飾明志之意，但旋後因家庭緣故，只好以白色粗布代服。¹¹⁴然而有許多清遺民選擇僧道衣著，甚至以僧道自號，表達自己是遺世方外、不容於社會的邊緣人。譬如李瑞清（1867-1920）嘗仿清初石濤（1630-1707？），假道號聊以自娛，因名「瑞清」而自稱「清道人」，以束髮道裝在上海鬻書賣字，一時遠近周知；¹¹⁵震鈞（1857-1920）易名唐元素，以黃衣黃冠的道家裝扮終其身；¹¹⁶王世忠亦著黃冠道服，閉戶不與世通，絕口不提世事；¹¹⁷汪兆鏞則兩至羅浮，注籍酥醪觀，自號「覺道士」，而他的好友張學華（1863-1951）亦自稱「閻道士」；¹¹⁸浙江嵊縣人鄭淦（1866 前-1916）曾任前清和州知府，清帝遜位時棄官棄家，入永嘉頭陀寺充當僧侶，法名靈照，溫州當地不時傳說有知府出家當和尚，吸引了任署海關監督的冒廣生（1873-1959）特意尋訪，並搜其舊手書稿。¹¹⁹選擇以「逃禪」方式做為避世的手段，此固在明清之際的遺民即已蔚為風氣，¹²⁰不過對照前引劉聲木所言「舉國競以服洋裝」的情形來看，對清遺民來說，僧道衣著或許不無在區分彼此之用意。他們既不願成為民國國民，更無意隨俗來易服剪辮，於是藉此凝聚共同認同的價值，無論以群體還是個人的身份，形成如人類學家 Victor Turner 所謂「社群」

114 《四筆》，卷十，總頁 888。

115 李瑞清，《清道人遺集佚稿》（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一九六一年，收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十二輯之《清道人遺集》內），〈復中國道教會書〉，頁 11；自在，〈清道人遇詐秘記〉，收在曹芥初等撰，《死虎餘腥錄》（上海：上海書店，二〇〇〇年），頁 83-85；黃維翰，〈清江蘇布政使臨川李公瑞清傳〉，收在錢仲聯主編，《廣清碑傳集》，頁 1310。

116 《五筆》，卷七，總頁 1017。

117 《隨筆》，卷八，總頁 173。

118 汪兆鏞，《清汪微尙老人兆鏞自訂年譜》，頁 37；張學華，〈誥授朝議大夫湖南優貢知縣汪君行狀〉，亦收入前書年譜，頁 63；張學華，〈微尙齋雜文序〉，收在汪兆鏞，《微尙齋雜文》，卷首部分。

119 劉成禹，《世載堂雜憶》（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頁 139-140；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二）》，收在《夏承燾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六冊，1938 年 9 月 10 日條，頁 45-46。

120 見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卷五，遺民之逃禪第十四，總頁 200-238；暴鴻昌，〈明季清初遺民逃禪現象論析〉，《江漢論壇》，3 (1992/3): 57-62。但明清之際也有遺民反對「逃禪」的方式，詳論見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頁 47-48。

(*communitas*) 象徵之意。¹²¹

五、結論

在結束本文之前，我想提出兩點看法，作為總結。

思想史研究目的在瞭解人類對其成長的社會及其變遷如何反應。特別對思想的脈動與發展而言，思想史將重構人類的行為、現象脈絡，並賦予意義，所以思想本身的歷史就是「意義的歷史」(*history of meaning*)。因此，史家在瞭解思想家所呈現的意義時，無論從他們本身著作的重要性還是普遍性來看，都不應忽略「文獻」(*documents*) 做為「文本」(*texts*) 的主體性。尤其傳統中國土人著書更是如此。如果我們擺脫時代背景對作者的影響，不從他們個人的現實關懷和困擾問題來釐清其侷限，那麼勢將難以掌握作者撰著若干關鍵之處。擴而大之，我們便無法得知整個時代的社會脈動、文化走向，在一位大人物抑或毫不起眼的小人物心中所產生的洶湧思潮。劉聲木的《萇楚齋隨筆》在以往的研究討論裡，多被視為文獻學著作，反倒未曾注意本書所要表達的意涵和時代脈動，可說是捨本而逐末了。

其次要瞭解這部筆記的意涵，我們還可自清季民初「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 的範疇來說明。¹²²透過劉聲木的例證可知，清遺民的思想資源非常多元，不但兼具傳統因子，也受到現代報刊輿論的影響，絕非如同我們原先既有的想像。綜觀《隨筆》雖是一本讀書筆記，但對時代脈動的對話卻清楚得見。

121 Victor W. Turner,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1969), pp. 131-165.

122 「政治文化」是政治學研究的一項重要概念。它指的是人們在特定時期所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感情和心理取向。此名詞始自一九五六年為 Gabriel Almond 所首次使用，近二十年來法國年鑑史家因強調心態歷史的重要，多援引該概念來分析。特別是關於法國革命，有許多史家如 François Furet、Mona Ozouf、Arlette Farge、Keith Michael Baker、Lynn Hunt、Dena Doodman、Jack Censer、Jeremy Popkin、Joan Landes 等紛紛擺脫馬克思史學理論解釋架構，注意舊政權到革命時期間民眾個人或團體的政治傾向及長期趨勢。見 T. C. W. Blann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Class War or Culture Clash?*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98), pp. 7-8.

書中討論的禮教問題、教育改革、婦女地位、男女社交乃至孝道看法等，無疑均係清季民初時興的公共輿論（public opinion）。¹²³這些輿論內容所引發的爭論，是中國在面臨政治、社會變革下，「政治文化」產生轉變的後果。近來已有史家開始關注此一課題，探索其中的影響。¹²⁴反觀劉氏看法背後，正道出一位身在民國以後的清遺民，如何對當時各項紛擾的社會、政治的「輿論氛圍」裡提出因應之道。而因應的價值取向也以辛亥清室鼎革後的政治情勢做為前提。他的言論思路，借用法國革命史家所談的「政治文化」來說，每項口號或主張的出現，無疑來自自我個人和團體所形成的共同認同和區隔，而且是透過語言來維繫彼此關係的。¹²⁵劉聲木對「風俗」各式各樣的論點和態度，其意涵正說明清遺民如何來討論上述公共輿論。換言之，劉聲木與其他清遺民的處境和反應，無一不表現在民國初年紛擾的「政治文化」當中。可是和新式知識分子所能運用報章、宣傳等工具不同的是：劉氏這樣的見解，卻只能在自己的著述中娓娓道出，殆見新／舊差異之處。據此又知，清遺民所歸附的傳統道德和價值，在失去強而有力的傳播工具來散佈後，所賸下的僅是個人在私領域自我的維繫。這點或許一直是他們向來刻意所要區隔的自覺，但卻也是他們面臨的最大難題。

123 有關 public opinion，我是借用 Jürgen Habermas 的看法。見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pp. 89-102.

124 如同 Henrietta Harrison 所指出：近代中國「政治文化」開始出現變化，一九〇〇年代是一項極為重要的指標。因為這十年間，所有和帝制體制相關的政治體系陸續瓦解；在此之後，一個新的「政治文化」誕生，強調君主立憲體制於是成為清廷在政治上努力改革的目標，乃至民國共和肇興，政治形態完全幾乎與傳統帝制迥異。不惟如此，社會方面和民眾普遍的情感也將隨之受到影響。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8-9.

125 Keith Michael Baker,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Essays on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4-5.

徵引書目

一、史料文獻

1. 《大清法規大全》，臺北：宏業書局，一九七二年。
2.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
3. 吳道鎔，《澹盦文存》，臺北：大華印書館影印，一九六八年。
4. 吳慶坻，《辛亥殉難記》，臺北：明文書局影印，一九八五年，收在清代傳記叢刊第六十四種。
5. 李瑞清，《清道人遺集佚稿》，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一九六一年，收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十二輯之《清道人遺集》內。
6. 汪兆鏞，《清汪微尙老人兆鏞自訂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一九八〇年。
7. 汪兆鏞，《微尙齋雜文》，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一九六七年，收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八十三輯。
8. 林紓，《畏廬文集》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一九二三年。
9. 金啓華譯注，《詩經全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10. 金梁，《瓜圃叢刊敘錄》，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一九六八年，收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十九輯。
11. 胡思敬，《國聞備乘》，重慶：重慶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12. 倫明，《辛亥以來藏書記事詩》，北京：燕山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13. 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二）》，收在《夏承燾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六冊。
14. 徐珂編撰，《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第四冊。
15. 張之洞，《輶軒語》，收在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十二冊。
16. 張其淦著，祁正注，《明代千遺民詩詠》，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一九八九年。
17. 張學華，〈誥授通奉大夫翰林院編修吳君行狀〉，汪兆鏞纂輯，《碑傳集

- 三編》，香港：大東圖書公司影印，一九七八年，頁 2155-2160。
18. 曹芥初等撰，《死虎餘腥錄》，上海：上海書店，二〇〇〇年。
 19. 陳寶琛，《滄趣樓文存》，陳懋隨自刊排印本，一九八八年。
 20. 陳瀨一，《新語林》，上海：上海書店，一九九七年。
 21. 楊鈞，《草堂之靈》，長沙：成化書局，一九二八年。
 22. 趙爾巽等纂，國史館校註，《清史稿校註》，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九年。
 23.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24. 劉成禹，《世載堂雜憶》，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
 25. 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桐城文學撰述考》，臺北：世界書局，一九七四年。
 26. 劉聲木，《萇楚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
 27. 劉體智，《異辭錄》，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第二次印刷。
 28. 錢仲聯主編，《廣清碑傳集》，蘇州市：蘇州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29. 歸莊，《歸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30. 羅正鈞，《辛亥殉節錄》，臺北：明文書局影印，一九八五年，收在清代傳記叢刊第六十四冊。
 31. 顧炎武，《顧亭林文集》，臺北：新興書局，一九五六年。

二、近人論著

1. 方勇，《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年。
2. 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
3. 何冠彪，《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一九九一年。
4. 余英時，《方以智晚節考》，臺北：允晨文化有限公司，一九八六年。
5. 周全，《宋遺民謝翹及其晞髮集研究》，臺北：復文圖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6. 胡平生，《民國初期的復辟派》，臺北：臺灣學生書局，一九八五年。
7. 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上海：學林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8. 張舜徽，〈清人筆記條辨〉，《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9. 張維屏，〈紀昀與乾嘉學術〉，《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一九九八年。}
10.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六〇年。}
11. 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
12.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北京：三聯書店，二〇〇一年。}
13. 馮爾康，〈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二〇〇〇年。}
14. 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一九九四年。}
15.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七五年。}
16. 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啓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17.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18. 鄭師渠，〈國粹、國學、國魂：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19. 鄭偉章，〈文獻家通考〉，《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九年。}
20.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臺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二〇〇〇年。}
21. 謝正光，〈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22. 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23. 顧俊，〈南宋遺民劉辰翁之研究〉，《臺北：木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24. 王汎森，〈戊戌前後思想資源的變化：以日本因素為例〉，《二十一世紀》，45(1998/2): 47-54。
25.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和保守〉，收入氏著，〈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臺北：三民書局，一九九一年，頁 199-242。}
26. 周明之，〈由開明而保守—辛亥政局對王國維思想與心理的衝擊〉，《漢學研究》，11.1(1993/6): 103-134。
27. 周婉窈，〈清代桐城學者與婦女的極端道德行為〉，收在鮑家麟主編，《中

- 國婦女史論集第四集》，臺北：稻鄉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頁 185-251。
28. 岸本美緒，〈「風俗」與歷史觀〉，《新史學》，13.3(2002/9): 1-20。
29. 林毓生，〈論梁巨川先生的自殺〉，收入氏著，《思想與人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九三年，第八次印行，頁 197-227。
30. 暴鴻昌，〈明季清初遺民逃禪現象論析〉，《江漢論壇》，3(1992/3): 57-62。
31. 潘光哲，〈近代中國「民主想像」的興起（1837-189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二〇〇〇年。
32. 錢鍾書，〈魔鬼夜訪錢鍾書先生〉，收入氏著，《寫在人生邊上／人·獸·鬼》，臺北：書林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 7-13。
33. 橋川時雄，《中華文化界人物總鑑》，北京：中華法令編印館，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年）。
34. 嚴安生，《日本留學精神史：近代中國知識人の軌跡》，東京：岩波書店，一九九一年。
35. 瀬地山角、木原葉子，〈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良妻賢母主義〉，《中國—社會と文化》，4 (1989/6): 277-293。
36. Baker, Keith Michael,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Essays on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37. Blanning, T. C. W., *The French Revolution: Class War or Culture Clash?*,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98.
38. Bonner, Joey, *Wang Kuo-Wei: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39. Borthwick, Sally,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Er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40. Crossley, Pamela K.,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41. Edwards, Louise, "Policing the Modern Woman in Republican China," *Modern China*, 26.2 (April 2000): 115-147.
42. Elliott, Mark C.,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43. Franke, Wolfgang, *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44. Guy, R. Kent, "Who Were the Manchus? A Review Essa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1 (February 2002): 151-164.
45. Guy, R. Kent,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46. Habermas, Jürgen,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47. Harrison, Henrietta,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48. Hobsbawm, Eric,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 in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49. Hunt, Lynn, *The Family Romanc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50. Lieberman, Sally Taylor, *The Mother and Narrative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8.
51. Rawski, Evelyn S.,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52. Reynolds, Douglas R., *China, 1898-1912: the Xin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53. Rhoad, Edward,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54. Schutz, Alfred and Thomas Luckmann, *The Structures of the Life-World*. trans. by R. M. Zaner and H. T. Engelhardt, Jr., Evanston: 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 1973.
55. Schwarcz, Vera,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56. Schwartz, Benjamin I., "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World Order, Past and Present,"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 M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276-288.
57. Sen, Sudipta, "The New Frontiers of Manchu China and the Historiography of Asian Empires: A Review Essa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1 (February 2002): 165-177.
58. Turner, Victor W.,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1969.
59. Wang, Y. C.,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6.

The mentalities and appearances of Qing loyalists in Republican China: the case of Liu Sheng-mu and *Chang Chu Zhai essays*

Chih-hung Lin*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mentalities and appearances of Qing loyalists in Republican China except for macro-intellectuals and their political restoration. Here I take a case of Liu Sheng-mu (劉聲木，1878-1959) and his *Chang Chu Zhai essays* (萇楚齋隨筆), the item for my discussion m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I investigate “intellectual source” of Liu Sheng-mu and try to understand mentalities of Qing loyalists. 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some features of the Liu’s concept of “fengsu” (風俗，social customs and habits), and observes how to treat and explain social orders or human relationships. Finally, the third part of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symbolic meanings of Qing loyalists in terms of their compiled biographies, clothes and appearances.

In the past, *Chang Chu Zhai essays* was always viewed as a resource of philology. People seldom look for the meanings in *essays* which the author would express and debate. In reality, of these themes in *essays* such as *lijiao* (禮教，feudal ethics and rites), new education, position of women, even views of *shaodao* (孝道，filial piety) and so on, are public opinions discussed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That is to say, all kinds of Liu’s opinions and affairs also prove the appearances and responses of Qing loyalists in “political culture” of early Republican China.

Keywords: Qing loyalists, Liu Sheng-mu, *Chang Chu Zhai essays*, fengsu, political culture

* Postgradu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